

舒大剛 李文澤 主編



巴蜀全書

三蘇經解集校

sansu
jingjie jijiao

上
冊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四川大學出版社

於復而至於... 世不若大壯與夫... 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 迫而逐之使之窮而无歸... 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 而小人在外不為无措然後... 泰之所以為最安也

也物至於... 矣不可以有加矣... 初成之即天地之宜而輔相... 否而已否未有不自其已甚... 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

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

三蘇經解集校

sansu
jingjie jijiao

上
册

舒大剛

李文澤

金生楊

舒大剛
張尚英

李文澤
尤瀟瀟

主編
校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舒 星
責任校對：謝正強 高慶梅 袁 捷
封面設計：墨創文化
責任印製：王 煒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蘇經解集校 / (北宋) 蘇洵, (北宋) 蘇軾,
(北宋) 蘇轍原著; 舒大剛等校注. — 成都: 四川大學
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690-1272-9

I. ①三… II. ①蘇… ②蘇… ③蘇… ④蘇… III.
①蘇洵 (1009—1066) — 文集 ②蘇軾 (1036—1101) — 文集
③蘇轍 (1039—1112) — 文集 IV. ①I214.4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259531 號

書名 三蘇經解集校

主 編 舒大剛 李文澤
校 注 舒大剛 李文澤 金生楊 張尚英 尤瀟瀟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90-1272-9
印 刷 四川盛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張 64.75
字 數 13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780.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
電話:(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 ◆網址:<http://www.scupress.net>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週邊亦屬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善、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撰寫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化

——《巴蜀全書》前言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群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脈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荆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綜覽巴蜀文化 提高文化自覺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裏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裏不僅有大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文化諸古城遺址、三峽考古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抵禦強侮、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陳壽、常璩、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李心傳、魏了翁、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趙世炎、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樂為蒼生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良多，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釋”、“道”交互構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儒學是其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的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遵（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軾（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張栻（著《南軒易說》）、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箍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迭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炘有“唐後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爲《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與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爲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爲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吳船錄》和《驛程記》。洎乎近世，郭沫若、巴金，蔚爲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群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

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書》，斥責專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為“上繼孟、荀、陽明，下啟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託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閬中落下閬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世界上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正負開方法”俱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慎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蘇舜元，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閬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咨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過、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欽、舜元，俱善詩文，號稱“銅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壁、臺，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煥，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增強文化自信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十世紀後期）又出現了“交子雙色印刷術”，標誌着雕版印刷的產生、成熟和創新，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

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刊印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文獻和巴蜀文獻為主的《函海》，可視為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激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三、編纂《巴蜀全書》，推動文化自強

《巴蜀全書》作為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為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

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儘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逐漸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蜀學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

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

希望《巴蜀全書》的編纂能為巴蜀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蘇擁篲前趨，掃除蕪蕪；至於創新發展，開闢新境，上繼前賢，下啟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謹在此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五月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修訂

凡 例

一、此書係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經學文獻的結集與整理，旨在彙編最全的三蘇經解著作，為北宋“蜀學”研究提供最全面、最系統的經學史料。

二、此次整理以《易》、《書》、《詩》、《春秋》、《論語》、《孟子》、《老子》以及六經論的順序排列；六經論係三蘇父子有關經學的單篇論著合集，茲定名為《三蘇經說》。

三、此次整理的內容以明代焦竑匯刻《兩蘇經解》所收七種經解著作（《蘇氏易傳》、《東坡書傳》、《詩集傳》、《春秋集解》、《老子解》、《論語拾遺》、《孟子說》）為基礎，增添散篇和輯佚資料，共計九種。

四、重輯《論語說》，在卿三祥、馬德富、舒大剛等先生對《論語說》輯佚補苴基礎上，參以青年學者谷建、許家星研究成果（以上凡有採錄，必注依據），重新輯校編排，並新增條目五十餘條。

五、各書均有整理叙錄，簡要介紹作者生平和成書過程與流傳情況，各書的相關著錄信息、評論文獻以附錄形式附在各書之後。前人對各書內部篇章有評論者，則附於相關篇章之下。

六、由於原有傳世文獻刻本用字較為隨意，常出現各種異體字混用的情況，有欠規範，如於、于；无、無；惟、唯；舍、捨；祇、祇；修、脩；迹、跡；采、採；況、況；游、遊；疏、疎等字，為使全書文字更為合乎現代出版規範，本次整理特別對上述文字進行了規範統一。因所收錄先秦儒家經典經文所用字多為字形較簡的古字，而三蘇文字均為解經而作，故對於本書上述文字特別採用從簡從古的原則進行規範，特殊用法除外。此次整理的校注、叙錄、評述等文字使用規範繁體字。

七、此次整理所收各篇，均以足本、善本為底本。所用底本和校本，在每種書《叙錄》加以說明。底本確有錯訛，則據校本改正，並出校記；異體字、避諱字，形近而誤者，徑改之，不出校記。

八、《三蘇經說》所收之文，若蘇軾、蘇轍二人作品互見，因各有出處，均予兩存，可以互參。

九、為便讀者，所收各書均有目錄，篇題一般以底本為據，原本若無而又必須者，則新擬增入。

前 言

新版《三蘇經解集校》係北宋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經學論著的彙編，該書以明代焦竑所輯《兩蘇經解》為基礎，增輯《三蘇經說》和蘇軾《論語說》（輯本），採用優秀版本進行校勘，每種或各節附有諸家評論。它們是北宋“蜀學”的重要代表作，也是至今尚可考述的較早的宋人經學著作。

一、《兩蘇經解》：蘇氏經學文獻及現狀

經學歷史源遠流長，發展至兩宋時期日漸興盛並逐漸轉型，形成了以義理探究為中心的新學說，被清人稱為“宋學”。宋代經學成果不但數量龐大，而且思想精深，但若論成就全面、成果斐然、影響深遠之家族或學術門派，當首推眉山“三蘇”，即蘇洵、蘇軾、蘇轍三父子，他們各有所長又相互影響，形成了獨特的蘇氏經學體系。

蘇洵著有《六經論》、《洪範論》和《太玄論》，肇開宋代經論文獻之先聲。蘇軾著有《易傳》、《書傳》和《論語說》，他對自己的三種經學著作十分看重，以為三書既成，“便覺此生不虛過”，相期為後世學人有以知道自己學術成就、主體思想的重要成果。蘇轍著有《詩集傳》、《春秋集解》、《老子解》等書，亦皆其精力所萃。他的《詩集傳》一書，自撰寫伊始至完稿殺青，前後用了將近五十年時間，可謂耗費了其畢生的精力和心血。可惜二蘇的經解寫成後，由於朝廷“黨禁”和打擊“元祐學術”，未能得以全部刊行和推廣，其學術影響力沒有達到應有效果。直至當下，研究三蘇（或兩蘇）者，也多是在他們的詩文之間做活計，卻對他們精力所萃的經學著作注意不夠。

根據目錄書著錄，北宋只有《詩集傳》、《易傳》刻本，其他各經均以鈔本形式流行於學者和藏家之間，訛脫多有，傳本甚稀。而蘇軾《論語說》由於長期沒有刻本，竟在人們的疏忽之中失傳了。直至明萬曆年間，焦竑經多方收集二蘇著述，僅得：

蘇軾《東坡先生易傳》九卷，《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蘇轍《穎濱先生詩集傳》十九卷，《穎濱先生春秋集解》十二卷，《論語拾遺》一卷，《孟子解》一卷，《穎濱先生道德經解》（《老子解》）二卷。

而蘇軾所撰《論語說》一書，已無從可覓！焦氏將收集所得匯為《兩蘇經解》，並撰序給予極高評價。萬曆二十五年（1597），畢氏將書稿刊刻於世，人們始見二蘇經學成就之原貌。後十四年，顧氏又據其本再次翻刻，二蘇的經學著作始大行於時，為學人

所重。其版本，目前則主要有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畢氏刻本、萬曆三十九年（1611）顧氏刻本。此後東坡《易傳》和《書傳》曾有多次翻刻；蘇轍《老子解》還收入《道藏》之中。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曾將《易傳》、《書傳》、《詩集傳》、《春秋集解》、《老子解》、《論語拾遺》、《孟子解》收錄入庫，逐漸為人所知。此外還有日本京都大學漢籍善本叢書本，係日本京都同朋舍於昭和五十五年（1980）據萬曆二十五年刊本影印。以上版本大都是輾轉翻刻，校勘欠精，使用不便。目前學界對三蘇的《蘇氏易傳》^①、《東坡書傳》^②、《詩集傳》^③、《春秋集解》^④、《論語說》與《論語拾遺》^⑤等論著分別有不同程度的闡釋；但對三蘇經學的整體研究卻不夠^⑥，且少有關於蘇洵經學的研究；至於對於三蘇經學文獻進行全面的整理，就更顯不足了。今借《巴蜀全書》編輯出版之機，特以《兩蘇經解》（七種）為基礎，增輯《三蘇經說》和蘇軾《論語說》，合計十一類五十餘種，借以構成三蘇父子的經學體系。

需要提及的是，三蘇父子之於經典文獻，非僅限於儒家經典，而是兼治《老子》、《莊子》，蘇軾有《廣成子解》，蘇轍有《老子解》，突出地表現了蘇氏蜀學儒道合一的治學理路。

二、“六經五子”：三蘇的經學著作體系

三蘇父子在文學上獨佔“唐宋八大家”三席，人稱“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由此形成了一段文壇佳話。“三蘇”並稱最早見於宋代王闢之所言：“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⑦蘇洵的文章博古通今，縱橫捭闔，《六國論》便足見其說理井然、氣勢磅礴；蘇軾的文章則豪放曠達、思維開闊，《赤壁賦》、《水調歌頭》等名篇都不難看出其文風豪邁和心境坦蕩；

① 參見安文妍：《〈蘇氏易傳〉的形而上學思想》，《中國哲學史》2015年第3期；金生楊：《〈蘇氏易傳〉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② 參見舒大剛：《蘇軾〈東坡書傳〉述略》，《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劉威：《〈東坡書傳〉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③ 參見向熹：《蘇轍和他的〈詩集傳〉》，《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陳明義：《蘇轍〈詩集傳〉研究》，臺灣東吳大學1993年碩士論文；李冬梅：《蘇轍〈詩集傳〉新探》，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劉茜：《蘇轍〈詩集傳〉以史為據的闡釋特徵》，《浙江學刊》2016年第1期。

④ 參見葛煥禮：《論蘇轍〈春秋〉學的特點》，《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杜敬勇：《〈春秋集解〉的解經特色》，《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祝莉莉：《蘇轍〈春秋集解〉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⑤ 參見賈喜鵬、王建弼：《論蘇軾〈論語說〉的新異與特色》，《樂山師範學院》2013年第10期；唐明貴：《蘇轍〈論語拾遺〉的詮釋特色》，《中國哲學史》2013年第1期。

⑥ 目前主要有張力《論三蘇經學的得失》（《蜀學》第七輯，2012年）評價了三蘇經學的得失，高明峰《三蘇經學與文學述論》（《國學學刊》2013年第3期）對三蘇經學的總體成就進行了概述。

⑦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2頁。

蘇轍受其父兄的影響，其文章也有一番深厚純粹、明靜澹遠的意味。蘇軾曾說：“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裡漸融明。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①而蘇轍則這樣評價父兄對自己的影響：“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②三蘇之間相互影響又自成一派的學術風格，不僅體現在文學創作中，也體現在其豐富的經學著作裡。

三蘇一生潛心學術，著述頗豐，父子三人著作的內容涉及經、史、子、集各個方面，其中經學類著作共有七十餘種（篇），可分為十一類：（一）周易類，（二）尚書類，（三）詩經類，（四）三禮類，（五）樂經類，（六）春秋類，（七）中庸類，（八）論語類，（九）孟子類，（十）小學類，（十一）道家類，涉及儒家“六經”、《論》、《孟》、《中庸》和道家《老》、《莊》，初步構成“儒道結合”的“六經五子”經典體系。他們的經學著作視野廣博、一脈相承，可以說共同形成了一個完備的學術體系。現試列表分類如下：

三蘇經學著作類目表

序號	類目	種目	作者	種數
1	周易類 (13種)	蘇洵	5	《六經論》之《易論》，附《太玄論》三篇、《太玄總例》
		蘇軾	4	《蘇氏易傳》九卷、《易論》、《易解》、《孔子贊易有申爻辭而無損益者》
		蘇轍	4	《易論》（與軾同）、《易說》三篇
2	尚書類 (18種)	蘇洵	4	《六經論》之《書論》，《洪範論》三篇
		蘇軾	12	《東坡書傳》二十卷、《書論》、《乃言底可績》、《聖讒說殄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王者惟歲》、《作周恭先作周孚先》、《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庶言同則繹》、《道猶升降政由俗革》
		蘇轍	2	《洪範五事說》、《書論》（與軾同）
3	詩經類 (5種)	蘇洵	1	《六經論》之《詩論》
		蘇軾	1	《詩論》
		蘇轍	3	《詩集傳》十九卷、《詩論》（與軾同）、《詩說》
4	禮類 (7種)	蘇洵	2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主撰）、《六經論》之《禮論》
		蘇軾	3	《禮論》、《禮以養人為本論》、《天子六軍之制》
		蘇轍	2	《禮論》（與軾同）、《天子六軍之制》
5	樂經類 (1種)	蘇洵	1	《六經論》之《樂論》

① 蘇軾：《初別子由》，《三蘇全書》第七冊，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第389頁。

②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三蘇全書》第十八冊，第224頁。

序號	類目	種目	作者	種數
6	春秋類 (15種)	蘇洵	1	《六經論》之《春秋論》
		蘇軾	11	《春秋論》、《鄭伯克段於鄆》、《鄭伯以璧假許田》、《取郟大鼎于宋》、《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禘于太廟用致夫人》、《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用郊》、《會于澶淵宋災故》、《黑肱以濫來奔》、《春秋變周之文》
		蘇轍	3	《春秋集解》十二卷、《春秋論》(與軾同)、《春秋說》
7	中庸類 (3篇)	蘇軾	3	《中庸論》三篇
8	論語類 (5種)	蘇軾	4	《論語說》(輯佚)、《王弼引論語以解易其說當否》、《君使臣以禮》、《觀過斯知仁矣》
		蘇轍	1	《論語拾遺》
9	孟子類 (3種)	蘇洵	1	《蘇批孟子》(作者存疑)
		蘇軾	1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蘇轍	1	《孟子解》
10	小學類 (1種)	蘇軾	1	《注石鼓文》
11	道家 (2種)	蘇軾	1	《廣成子解》
		蘇轍	1	《老子解》二卷

三蘇的研究涉及經學、道家“六經五子”諸類目，蘇洵擅長於《易》學（附《太玄》學）、“禮學”和《孟子》；蘇軾長於《易》、《書》、《論語》三經，兼治《莊子》，他對自己的《易傳》、《書傳》、《論語說》經學三部著作，尤為珍視；而蘇轍則長於《詩》、《春秋》和《論語》、《孟子》，兼治《老子》，其學說個人特色鮮明，標新立異之處並不鮮見。這些長篇的經學著作有的體現了父子三人各自的專長，有的則充滿了父子三人自相師友的繼承和批判，如《蘇氏易傳》又題“東坡易傳”，其實並非蘇軾一人獨撰，而是父子三人合力完成，而蘇軾著《論語說》後，蘇轍以為其中有不盡如意之處，便又著《論語拾遺》指出並發表自己的觀點。

長久以來，人們對於三蘇的稱讚都集中在文學方面，認為他們的散文、詩詞創作豪邁雄健、說理自然，卻對上述經學著作的價值缺乏重視。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三蘇本身文學作品的引人入勝、文學成就的輝煌，這毋庸贅述；二則是客觀政治環境對學術的影響，北宋“元祐黨爭”，朝廷打擊“元祐學術”使他們的著作並未在宋代全部刊行，僅有《詩集傳》、《易傳》刊刻流傳，實為遺憾。直到明代焦竑才將蘇軾、蘇轍的經學著作合刊編成《兩蘇經解》流傳下來。

三蘇對自己的經學著作是極為珍視並得意的。以蘇軾為例，元豐二年（1079），他

因“烏臺詩案”貶官黃州，爲團練副使；蘇轍也受到牽連，被貶筠州，監鹽酒稅。這一時期，兄弟二人爲官清閒，煩擾較少，遂在這種“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的境況中潛心研究經書。如蘇軾在黃州時云：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①

兄弟二人在遷謫的一兩年間，準備完成《易傳》、《書傳》、《春秋集解》、《詩集傳》和《論語說》的撰寫。又在《與王定國一》中說：“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子由亦了卻《詩傳》，又成《春秋集傳》。”^②這都表明在此期間，蘇軾、蘇轍兄弟已初步完成了《易傳》、《春秋集解》、《詩集傳》和《論語說》的寫作，蘇軾也同時着手《書傳》的寫作。紹聖四年（1097），蘇軾又被流放至儋州，蘇轍也再貶筠州，繼遷雷州。雖然二蘇兄弟在被貶之地都飽受艱苦生活的風霜打磨，但他們的經學研究卻在此時獲得了豐收，蘇軾十分高興地在《答李端叔三》中云：“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③他對自己的作品十分珍視，常“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④。蘇軾去世後，蘇轍爲他撰寫《墓誌銘》贊曰：

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⑤

蘇轍也曾說“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⑥，而蘇洵作《易傳》未逮，仍心心念念將之託付給兒子，促其完成自己的遺志。可見，父子三人對經學研究的重視，最終，這些蘊含了豐富學術思想的著作成爲蘇氏蜀學的代表作，爲時人廣泛認同並在後世逐漸刊刻流傳。

三、“蜀學”典範：三蘇“六經”論的相互影響

三蘇關於經典的短篇論述，以《六經論》爲代表，父子三人對《易》、《書》、《詩》、《禮》、《樂》、《春秋》各自闡發了自己的看法。蘇洵《六經論》包羅六經，蘇

① 蘇軾：《與滕達道二一》，《三蘇全書》第十二冊，第419~420頁。

② 蘇軾：《與滕達道二一》，《三蘇全書》第十二冊，第459頁。

③ 蘇軾：《答李端叔三》，《三蘇全書》第十二冊，第481頁。

④ 蘇軾：《答蘇伯固三》，《三蘇全書》第十三冊，第206頁。

⑤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三蘇全書》第十八冊，第223~224頁。

⑥ 蘇籀：《樂城遺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軾、蘇轍則對除《樂》以外的其他五經都有論述。三蘇自相師友、學術旨趣相近，蘇轍評價蘇洵、蘇軾道：

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①

三蘇之間在學術上的傳承與相互滲透，從其對六經的漸次解讀即可見一斑，父子三人合力推動了經典闡釋的不斷深入。

關於《易》。蘇洵作《易傳》是為了去掉時人的“傳會之說”，重現“聖人之旨”，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理解《周易》，他在撰寫《易論》時曾云：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②

在蘇洵看來，《禮》、《易》從明暗兩個方面維繫着聖人之道，使人們處處遵循而不敢廢棄。他在作《易傳》十卷一百餘篇後，便因力有未逮將繼續撰寫完成的使命交給了蘇軾、蘇轍兄弟。蘇軾二十一歲時便在《御試重巽以申命論》中對《易》之《巽卦》進行了闡述，謂其“配於風者”、“仁且順也”^③，後又有《易論》一篇詳細論《易》。得益於良好的易學研究基礎，蘇軾在蘇洵遺著的基礎上撰成《易傳》九卷。蘇轍也有《易論》一篇和《易說》三篇，收錄在蘇轍自編的《樂城集》與《應詔集》中。父子三人前赴後繼地對《周易》進行研究，最終撰成《蘇氏易傳》一書。《四庫全書總目》載：“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為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④蘇轍後人蘇籀的《樂城遺言》也證實了三人合力完成的事實：

先曾祖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為之解說。各仕它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猶是公解。^⑤

總的說來，此書是蘇洵打下基礎，蘇轍加入個人對卦辭的看法，由蘇軾總其成而完成的。老蘇先生還對揚雄的擬《易》之作《太玄》進行了研究，撰有《太玄論》等四篇著述。

關於《書》。蘇洵有《洪範論》三篇；蘇軾早年有多篇論著如《乃言底可績》、《聖讒說殄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王者惟歲》、《作周恭先作周孚先》等數種，

① 蘇轍：《歷代論》，《三蘇全書》第十一冊，第140頁。

② 蘇洵：《易論》，《三蘇全書》第六冊，第173頁。

③ 蘇軾：《御試重巽以申命論》，《三蘇全書》第十四冊，第108頁。按：題目原無“以”字，《三蘇全書》本據南宋郎晔《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本補。

④ 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頁。

⑤ 蘇籀：《樂城遺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